

福建文明史

中卷

徐晓望 著



福建文明史

中卷

徐晓望
著

中

卷

宗

教

信

俗

信

仰



第六章

福建的佛教与外来宗教

很少有人注意到,在福建历史上有一个佛教化的过程,它彻底改造了古代福建社会,其影响力不可低估。佛教化是汉化的另一方面。在历史上,学者对南方民族的汉化研究较多,有关争议也很大。何炳棣教授提出汉化的本质是儒化,或说儒教化。我倾向于何教授的观点。不过,在此基础上我还想指出:在中国南方民族发展史上,和儒化过程相伴的另一个过程是佛教化。古代福建社会的佛教化不仅早于儒教化,而且,它对福建底层社会的影响也远胜于儒教。

第一节 唐五代福建的佛教世界

福建佛教萌芽于吴晋时期,发展于东晋南朝,在唐五代时期达到高峰。迨至晚唐五代,中国北方多次发生禁佛运动,如唐武宗、周世宗“辟佛”,对佛教在北方的传播产生巨大影响。同一时期,福建处于地方政权割据时代,这些割据政权大都崇奉佛教,他们的影响导致佛教中心南移,福建一度成为禅宗佛教中心。唐五代以来,福建一直在中国汉传佛教界占有重要地位,是在这一时代奠定的基础。^①

一、闽中佛教溯源

佛教于东汉时期传入中国,于东汉明帝时广泛流传,主要在中原区域。黄仲昭说:“缙黄有庐,昉于后汉,而东南郡县犹未有也。自吴孙权始建。建初寺于江

^① 徐晓望:《论唐末五代福建佛教的发展》,新加坡《南洋佛教》,1994年,第302期。

东,建洞元观于方山,而后寺观始蔓延诸郡以及于闽。”^①据此,东南区域是在三国以后才有寺院的。其时,闽中人口稀少,在东吴统治时期福建是否出现了寺院?至今尚无定论。有人说,建瓯的林泉寺是由东吴大将吕蒙的子孙捐建,应是福建最早的寺院。但查看《建宁府志》的记载,其中还有不少疑问。《建宁府志》说:“开元禅寺,在云际山麓。晋太康中建,俗传为吴吕蒙故宅。又云:蒙子孙分居于此,后捐为寺。初名林泉。唐开元中赐今额。”^②可见,吕蒙子孙捐宅建院未必是在三国时期,准确地说,应是吕蒙的子孙迁居于闽,他们于西晋太康时将住宅捐给僧人,建造了林泉寺。其时,福建仅设建安郡,而其州治在闽北的建安县,所以,林泉寺应是闽中最早的寺院之一。闽北建于晋代的还有建阳县童游镇的灵耀教寺,“晋永康中建”,水陆寺,“东晋时建”。^③邵武的息庵属于佛教,建于晋元熙年间,回龙寺建于晋永和年间。^④福建建于南朝的寺院还有梁武帝时的浦城胜果寺、南平的普通院。^⑤以上值得注意的是:福建佛教的主流是从北方进入闽中,在闽中各郡中,以建州、福州、泉州为早。

据宋代梁克家《三山志·寺观》介绍:福州最早的寺庙建于晋太康年间,其中,侯官的药山寺建于晋太康元年(280),是为福建最早的寺院。灵塔寺和绍因寺都建于晋太康三年。《三山志》记载,福州在西晋建立三所寺院后,“既而终晋才益二寺,越二百载,齐之寺一,梁之寺十七,陈之寺十三,隋之寺三”^⑥。可见,在南朝时期,福州已经有了39座佛寺,其数量不大,这与福州开发之初人口不多有关系。隋朝的建安郡总共只有12420户,其时福州为闽县,为建安郡四县之一,就算建安郡一半人口在闽县,也不过6000来户,此地共有39座佛寺,从这个角度看,其数量不少。

南北朝时期,就隋代建安郡的范围来看,南朝梁时期新建31所佛寺,陈时期新建29所佛寺,这说明早期福建佛教在南朝梁以后有较大发展,这显然与梁武帝崇佛有重大关系。可以说,这时席卷中国的佛教热已经在闽中发酵。

① 黄仲昭:弘治《八闽通志》卷七六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0年,第773页。

② 张琦等:康熙《建宁府志》卷十六,祀典下,南平地区方志委1994年标点本,第251页。

③ 张琦等:康熙《建宁府志》卷十六,祀典下,第261-262页。

④ 张景祈等:光绪《邵武府志》卷二八,古迹,寺观,清光绪二十三年刊本,第17、26页。

⑤ 陶元藻等:乾隆《延平府志》卷十三,寺观志,清乾隆十一年刊本,第20页。按,《延平府志》记载普通寺建于五代梁朝普通年间,但五代时没有普通年号,“普通”实为南朝梁武帝年号之一,时为公元520-527年。

⑥ 梁克家:《三山志》卷三三,僧寺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2页。

南朝宋时期,闽北发生了这样一起事件:“元嘉元年(424),建安郡山贼百余人破郡治,抄掠百姓资产子女,遂入佛图,搜掠财宝。先是诸供养具,别封置一室。贼破户,忽有蜜蜂数万头,从衣簏出,同时噬螫。群贼身首肿痛,眼皆盲合,先诸所掠,皆弃而走。”^①

山区的马蜂常会悄悄地在人废弃的瓦缶中做窝,人们若无意中捅了马蜂窝,马上会遭到马蜂的还击。这类事情在山区很常见。但在以上故事中,“山贼”被蜂螫,则被解释为亵渎佛教的报应,它反映了佛教在民间受人尊重。不过,在隋朝以前,福建人口稀少,福建所建寺院也不多。

六朝时期,中国四大佛经翻译家之一拘那罗陀入闽,是这一时期福建佛教界的大事。据汤用彤等人的研究,拘那罗陀为印度人,精通大乘佛教,泛海至扶南国,受梁武帝邀请入华。因侯景之乱发生,梁武帝死,拘那罗陀辗转南方各地。陈武帝永定二年(558)入闽,挂锡晋安佛力寺,应僧人之请,在此参校佛经,译《正论释义》五卷等。两年后,来到南安郡建造寺,欲候船归国,于此地重译佛教名著《金刚经》。天嘉三年(562),拘那罗陀乘船入海,因风向不顺,漂回广州,终老于此。拘那罗陀在闽四年,受到各方的关注。南安郡太守王方奢对他颇为礼敬,跟他学习的僧人颇多,《金刚经》译完之后,法虔等僧人发誓造《金刚经》100部,并四处讲经,使新版《金刚经》流播开来。可见,当时的闽中有一股佛教热。



图 6-1 南安延福寺,传拘那罗陀曾居此处

① 陶潜:《搜神后记》卷二,文渊阁四库全本,第2页。

佛教的故事也流传到闽中,于是有了“闽版”的佛教故事。在晋朝吴均的《续齐谐记》一书中,记载了一个发生于福建绥安的佛教故事:

阳羨许彦相绥安(今福建泰宁)山行,遇一书生,年十七八,卧侧,云脚痛,求寄鹅笼中。彦以为戏言,书生便入笼。笼亦不更广,书生亦不更小,宛然与双鹅并坐,鹅亦不惊。彦负笼而去,都不觉重。前行息树下,书生乃出笼谓彦曰“欲为君薄设”。彦曰:“善。”乃口中吐出一铜奩子,奩子中具诸肴饌珍馐方丈,其器皿皆铜物,气味香旨,世所罕见。酒数行,谓彦曰:“向将一妇人自随。今欲暂邀之。”彦曰:“善。”又于口中吐一女子,年可十五六,衣服绮丽,容貌殊绝,共坐宴。俄而书生醉卧,此女谓彦曰:“虽与书生结妻,而实怀怨,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,书生既眠,暂唤之,君幸勿言。”彦曰:“善”。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,年可二十三,亦颖悟可爱,乃与彦叙寒温。书生卧欲觉,女子口吐一锦行障遮书生,书生乃留女子共卧。男子谓彦曰“此女虽有心,情亦不甚向,复窃得一女人同行,今欲暂见之,愿君勿泄。”彦曰:“善”。男子又于口中吐一妇人,年可二十许,共酌,戏谈甚久。闻书生动声,男子曰:“二人眠已觉。”因取所吐女人,还纳口中。须臾,书生处女乃出谓彦曰:“书生欲起。”乃吞回男子,独对彦坐。然后书生起谓彦曰:“暂眠遂久,君独坐,当悒悒耶?日又晚,当与君别。”遂吞其女子,诸器皿悉纳口中,留大铜盘可二尺广,与彦别曰:“无以藉君,与君相忆也。”彦,太元(晋孝武帝年号,376-396)中为兰台令史,以盘餉侍中张散;散看其铭题,云是永平三年(293)作。^①

据鲁迅的《中国小说史略》考证,这段故事原出于佛经。^②其内容是讲人间爱情的不可信,不论男女,都会背叛自己的爱人。从而宣传佛教世事无常的观念。佛教故事传播到福建,又成为民间口头文学,这反映了佛教对民间的渗透已很深了。

二、唐五代福建佛教发展的社会背景

唐五代时期,福建佛教发展进入高潮,尤其是五代之际,北方统治者严厉约束佛教的发展,在周世宗时发生了又一次灭佛事件,而南方统治者却在这一时期大力扶植佛教,一位僧人说:“五代之间,诸侯割据,天下瓜剖,训练士卒,更相吞噬,而佛法独盛于其时,以国王大臣犹能倾心奉道人重法故也。当是时,孟氏起西蜀、

① 吴均:《续齐谐记》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5-6页。

② 鲁迅:《中国小说史略》,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,第37页。

钱氏据浙右、李氏守江南，以至闽之王氏，皆严塔庙、崇圣教，延访高僧，咨求法要。”^①于是，在唐末五代南北对立的时代，佛教在南方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。而南方各道内，又以福建与浙江的佛教最盛。王审知的推官黄滔就坦率地说：治理国家光有儒教是不够的，“仲尼之祖述尧舜，宪章文武”，仍然不能改变人心日浇的现实；而“释迦牟尼于中土，大陈出生入死之理、天堂地法之事，以警戒之”，这对民众有教育意义，“上智闻之，若镜之磨，中智闻之，若泉之澄，下智闻之，若火之烧”，“故能销嗜欲，更祸福，一贵贱，则为裨教化之一源”^②。据说，王审知执政后，“乃大读儒释之书，研古今之理，常曰：文武之与释氏盖同波而异流，若儒之五常：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，仁者，含弘也，比释之慈悲为之近，礼者，谦让也，比释之恭敬为之近……信者，直诚也，比释之正直为之近……”^③因此，正如黄滔所说：“夫帝王之道，理世也，释氏之教，化人也，理世之与化人，盖殊路而同归。”^④显见，王审知与黄滔等统治阶级十分清楚佛教对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，因此，他们对唐末五代福建的崇佛热潮采用鼓励的态度，大盖寺院，超度僧人，对福建佛教的发展起了关键的作用。

唐五代，福建各阶层都迷恋于佛教，王氏贵族沉溺佛教达到惊人的地步。王审知不但礼敬僧人，还经常与僧人相互问答，互相探讨佛学的修养。《五灯会元》一书中记载了不少他与雪峰义存、玄沙师备、长庆慧稜、鼓山神晏参禅的事例。例如，有一次，王审知送玄沙师备上船，“师扣船召曰：‘大王争能出得这里去？’王曰：‘在里许得多少时也？’”^⑤王审知之外，其他王氏贵族也乐于延僧谈禅，王延彬是最著名的例子，他“能为诗，亦好说佛理，辞人禅客谒见，多为所屈”^⑥。王延翰的妻子崔氏喜与僧人交往，她拜福州长庆寺的慧稜为师，《五灯会元》记载了一个故事：闽帅夫人崔氏，遣使送衣物与慧稜禅师，“曰：‘练师（崔氏自称练师）令就大师请回信。’师曰：‘传语练师，领取回信。’须臾，使却来师前唱喏便回。师明日入府，练师曰：‘昨日谢大师回信。’师曰：‘却请昨日回信看。’练师展两手，帅问师曰：‘练师适来呈信，还惬大师意否？’师曰：‘犹较些子。’”^⑦从这段禅机来看，练师的

① 参见：郭朋《隋唐佛教》，齐鲁书社1980年，第373页。

② 黄滔：《黄御史公集》卷五，丈六金身碑，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本，第64页。

③ 黄滔：《黄御史公集》卷五，大唐福州报恩定光多宝塔碑记，第59页。

④ 黄滔：《黄御史公集》卷五，丈六金身碑，第65页。

⑤ 普济：《五灯会元》卷七，玄沙师备禅师，中华书局1984年，第398页。

⑥ 佚名：《五国故事》，《说郭三种》本，卷六四，第977页。

⑦ 普济：《五灯会元》卷七，庆慧稜禅师，第404页。

回答还是契中三昧的。

在统治阶级鼓励之下,这一时代福建民间对佛教极为狂热,玄沙师备南游时“莆田县排百戏迎接”^①;释慧恭来到泉州,“所至之所,檀施臻集,徒侣解钵,禅坊立就,其为士庶向奉如此”^②。许多人还把家财舍入寺院,五代时,“莆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,多至五百余区”^③。他们对佛教极为虔诚,杨徽之“崇奉释典,酷信因果,每五鼓即起盥漱,诵金刚经,如是者三十年,未尝暂废,所诵亦十数万过矣”^④。普通百姓也不亚于士大夫家庭,宋代理学家黄榦说:“王氏入闽,崇奉释氏尤甚,故闽中塔庙之盛甲于天下。家设木偶、绘像,堂殿之属,列之正寝,朝夕事之惟谨。”^⑤通常闽中每有佛事,老百姓都踊跃参加,王审知于天祐三年铸造三尊金铜佛像,他的部下“自宾席之逮将校,将校之逮步乘,步乘之逮众庶”,都慷慨出钱赞助,佛像铸成之日,民众像过节一样,“檀信及门而膝地,童耄遍城而掌胶”^⑥,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风气。

佛教与知识分子。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向有反佛的倾向,然而,唐五代之际,闽中儒士对佛教迷恋之深更超过他人。诗人周朴寓居闽中僧寺,“郡中豪贵设供,率施僧钱,朴即巡行,拱手各丐一钱”^⑦。翁承赞与僧人亚齐结为好友,他寄给亚齐的诗写道:“萧萧风雨建阳溪,溪畔维舟访亚齐。一轴新诗剑潭北,十年旧识华山西。吟魂惜向江村老,空性元知世路迷。应笑乘轺青琐客,此时无暇听猿啼。”^⑧这类和僧人来往的诗很多,黄滔有《送僧》,崔道融有《访僧不遇》,韩偓有《寄禅师》,孟贯有《宿山寺》,这都表明他们对佛教是热心的。有些高级知识分子甚至自愿踏入空门,例如释慧恭,出生于福州的一个醇儒之家,年轻时考中进士,“因游终南山奉日寺,目祖师遗像,释然世纲,遂求出家”^⑨。又如南唐僧人应之,“本王姓,其先闽人也。能文章,习柳氏笔法,以善书冠江左。初举进士,一黜于有司,投册骂曰:‘吾不能以区区章句取程于庸人!’遂削发为浮屠”^⑩。尽管他们出家的理由

① 普济:《五灯会元》卷七,玄沙师备禅师,第400页。

② 赞宁:《宋高僧传》卷一二,唐天台紫凝山慧恭传,中华书局1987年点校本,第291页。

③ 李俊甫:《莆阳比事》卷一,江苏古籍出版社宛委别藏本,第3页。

④ 杨亿:《武夷新集》卷一一,杨公(徽之)行状,第23页。

⑤ 黄榦:《勉斋集》卷三七,处士唐君焕文行状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17页。

⑥ 黄滔:《黄御史公集》卷五,丈六金身碑。第63-64页。

⑦ [清]郑方坤:《全闽诗话》卷一,文渊阁四库全书本,第33-34页。

⑧ 翁承赞:《访建阳马驿僧亚齐》,《全唐诗》卷七〇三,第8088页。

⑨ 赞宁:《宋高僧传》卷一二,唐天台紫凝山慧恭传,第291页。

⑩ 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一九,僧应之传,中华书局1983年点校本,第467页。

不同,僧人中藏龙卧虎却是事实。又如僧文超“博通内外学,声闻朝野。太祖从子延彬时为泉州刺史,以文超雅善诗,构院于开元寺殿东,曰清吟,延之居焉。门弟子多贤者,无晦文章尤知名”^①。以他们的文学涵养,对普通知识分子产生强大的吸引力,不为奇怪。五代之后,许多知识分子以懂些禅理而骄傲,五代时,禅宗高僧如云,知识分子被他们所吸引是很自然的。一般地说,知识分子对社会与舆论有强大的影响力,他们能心悦诚服地接受佛教,标志着佛教深入人心。纵观福建历史,佛教拥有这么浓厚的社会基础只有这个时代,宋代福建知识分子对佛教便开始采取批评态度了。

总之,闽国时期福建僧人的社会地位很高,李仁达在福州发动政变后,推出僧人卓俨明做皇帝,就是因为他看中卓俨明在百姓中有很高的威望,僧人被从寺院推上皇帝宝座,五代时仅此一例,中国历史上也不多见。

三、唐五代福建佛教发展的事实

第一,大盖寺院。在这一时期,福建的统治者无不广盖佛寺,老百姓也积极捐助佛寺的建设,许多人将家园施舍为僧宅,留从效“施旧宅,以养僧徒,是为封崇院”。詹郭仁在留从效的影响下,“亦遂拓介庵为清禅院,劝化里人林氏等,家田资以给僧徒衣钵之用,院复像而祠之”^②。结果造成福建佛寺数量空前膨胀,《三山志》写福州的情况:“唐自高宗至于文宗二百二十二年,寺止三十九,至宣宗乃四十一,懿宗一百二,僖宗五十六,昭宗十八。殫穷土木……极天下之侈矣;而王氏入闽,更加营缮,又增为寺二百六十七,费耗过之。自属吴越,首尾才三十二年,建寺亦二百二十一(自前至此,共为寺七百八十一)。虽归朝化,颓风弊习浸入骨髓,富民翁姬,倾赀产以立寺院亡限。”^③其他各州寺院之多也不亚于福州,五季宋初建州的佛寺落落相望,杨亿说,“建安佛寺三百五十一,建阳二百五十七,浦城一百七十八,崇安八十五,松溪四十一,关隶五十二,仅千区(实为964所)。而杜牧江南绝句云:‘南朝四百八十寺’,六朝帝州之地,何足为多也!”^④。以故,当地府志写

① 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九,僧文超传,第1419页。

② 詹镔:《清隐先生传》,原出安溪《清溪詹氏族谱》,卷二三,录自:詹敦仁纪念馆《詹郭仁学术研究资料汇编》,2000年自刊本,第47页。

③ 梁克家:《三山志》卷三三,僧寺,第2页。

④ 江少虞辑:《宋朝事实类苑》卷六一,建州多佛刹,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点校本,第816页。

道：“缙黄所处，金碧辉映，曾不知其几千万落。”^①其他各州郡的情况一无例外。由此可见，闽国前后时期，福建的寺院数量极多，就以上数字而言，福州有 781 所，建州有 964 所，前引数字表明，莆田一县即有 500 余所，再加上泉州、漳州、汀州、剑州诸县，估计福建寺庙总数会有三四千所，这是个惊人的数字！五代后周王朝辖地是福建的十几倍，人口是福建的几十倍，在经历周世宗灭佛事件后，其境内重新登记的寺院仅 2694 所，尚不如福建一地多。^②大致说来，中国佛教最盛的时候是在南北朝与隋唐时期，但也就在这一时期，中国发生了“三武一宗”灭佛的事件，给佛教打击很大。“三武一宗”即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、唐武宗与周世宗，这四次大规模的灭佛事件，有三次发生于南北分裂时期，而且主要发生于北方，影响南方的灭佛事件仅唐武宗时期一次，所以，经历“三武一宗”灭佛事件之后，南方佛教的发展远胜于北方了。

第二，剃度僧人。中原政权对剃度僧人控制较严。五岁以上能背诵经文百页或诵读五百页的、女子十三岁以上能背诵七十页或读诵三百页以上的，才能剃度为僧。梁开平年间，王审知为祝贺新建的梁朝，专门建立一所“万岁寺”，为后梁祝福。然而，尽管这座庙具有重要的意义，梁朝也只允许万岁寺“度僧四十九人”。^③吴国和南唐也限制僧人剃度：“淮南不度僧尼、不滋医卜，已六十年矣。”^④因此，福建、浙江之外，僧人数量有限。然而福建境内却毫无限制地剃度僧人。例如，光化元年(898)，王审知于福州乾元寺开戒坛，度僧 2000 人；天复二年(902)，他又于开元寺度僧 3000 人。王审知的子孙也仿效他的做法，天成三年(928)，王延钧于太平寺度民 20000 为僧^⑤；永隆二年(940)，王延羲度僧“万一千人”^⑥。后周全境僧尼不过 61200 人。^⑦而闽国仅根据以上几项不完全的数字，剃度僧人即达 36000 人。宋至道元年(995)，“太宗览泉州僧籍，一岁未度者近四千余。语近臣曰：古者一夫耕三人食，尚有受其馁者，近世一夫耕殆至十人食者，黎民安得不困。东南风

① 谢纯、汪佃等纂：嘉靖《建宁府志》卷一九，寺观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1964 年影印天一阁本，第 1 页。

② [日]镰田茂雄：《简明中国佛教史》，中译本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，第 255 页。

③ 薛居正等：《旧五代史》卷五，太祖纪五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，第 5 页。

④ 《册府元龟》卷五四七，谏诤部，直谏，第 6575 页。

⑤ 梁克家：《三山志》卷三三，僧寺，第 6 页。

⑥ 吴任臣：《十国春秋》卷九二，景宗本纪，第 1337 页。

⑦ [日]镰田茂雄：《简明中国佛教史》，中译本，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年，第 255 页。

俗惰游,固非乐为清静,但慵耕种,避徭役耳”^①。可见,五代宋初福建僧人之多是有名的。

第三,缮修经典。唐末五代福建僧人积极搜罗佛教经典,使福建成为佛教文献中心之一。如仙溪县僧人清忠,“尝取经西川,得金水写经以归,泛海为海神取去;再往,得银水写经,复为盗劫。又往,川人疑其为贩经者,欲杀之。自断右手以誓,血成血乳,川人异之,得墨字经以归,皆腊纸楷书……五代蜀天汉三年,敕赐紫衣。归建道场于龙华寺之东偏。闽贞明五年,敕补律大德”^②。各种经典的流入,是福建成为佛教发达区的必需条件。

闽国的几个统治者都很注意缮写经典。王潮成为威武军节度使之后,“缮经三千卷,皆极越藤之精,书工之妙,架以白马十乘”,送至泉州开元寺藏经楼收藏^③。王审知曾经“藏佛经于寿山,凡五百四十一函,总五千四十八卷”^④。他还为福州开元寺制作了许多经典,“泥金银万余两,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,旃檀为轴,玉饰诸末,宝髹朱架,纳龙脑其中以灭蠹蟬”^⑤。王延钧自称皇帝后,“缮经二百藏”^⑥,他们这些行动使福建佛教文献大备,佛学研究条件大为改善。五代以后,福建一直以佛经收藏著称于世。宋代,福建寺院两次印刷《大藏经》,这显然是以五代闽国的藏经为基础的。

第四,僧人著作层出不穷。唐五代时期,福建僧人著作不少,泉州开元寺僧叔端著有“《义苑搜隐》、《宗镜》、《四缘诸抄》凡数十卷”^⑦;释净、释筠编撰了《祖堂集》,是为禅宗历史上的名著之一;释道昭注《成唯识论》凡80卷^⑧;义存的弟子宝闻著《续宝林传》四卷,“纪贞元后宗门继踵之源流”^⑨,这是福建重要的僧史著作;义存著有《真觉语录》^⑩,行修著《语录》^⑪,而名僧曹山本寂“少染鲁风,率多强学”,他整理老师洞山良价的思想,发表于世;除此之外,他“复注《对寒山子诗》”,

① [宋]王象之:《舆地纪胜》卷一三四,第3750页。

② 黄岩孙:宝祐《仙溪志》卷三,仙释,第59页。

③ 黄滔:《黄御史公集》卷五,泉州开元寺佛殿碑记,第55页。

④ 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十,闽太祖世家,第1302页。

⑤ 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十,闽太祖世家,第1313页。

⑥ 吴任臣:《十国春秋》卷九一,惠宗本纪,第1326页。

⑦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开士志,泉州开元寺自刊本,第24页。

⑧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开士志,第25页。

⑨ 何乔远:《闽书》卷一三六,福建人民出版社1993年点校本,第4047页。

⑩ 陈衍等:民国《福建通志》,《福建方外志》存目,卷三八,第1页。

⑪ 陈衍等:民国《福建通志》,《福建方外志》存目,卷三八,第1页。

流行寓内,盖以寂素修举业之优也。文辞迢丽,号富有法才焉”^①。其时,一般的名僧皆有《语录》传世,僧人的文化水平是很高的。

明代何乔远说:“要以释衲之徒,《五灯会元》所载,闽中为盛。而闽中之盛又在王审知有闽之时。”^②以上所列唐五代福建大建寺院、剃度僧人、缮修经典、著书立说等事实,表明福建佛教的发展在国内是罕见的。

四、唐五代福建佛教的教派

唐代福建佛教以禅宗最为发达,有影响的名僧多为闽人。除此之外,福建还有律宗、法相宗、华严宗、净土宗等佛教诸派传播。其中,又以律宗最为重要。

约在东晋时期,佛教《十诵律》《四分律》《摩诃僧祇律》等律典被翻译到中国,于是,有人专门研究律典,迄至北魏法聪精研四分律,创立了四分律宗,律宗便开始在国内传播开来。唐代福建的律宗颇盛,长汀县的开元禅寺,“初有律院二十四,环布其间。……唐钟翱为刺史,舍田入寺,计产钱二十千八百七十一文”^③。律宗的特点是研习及传持戒律,著名的泉州开元寺开山祖匡护“律行良谨”,是为福建律宗之祖^④。唐代晚期,泉州开元寺和尚弘则“传总律师四分”,在泉南很有威望。唐末,泉州刺史王审邽“以师秉戒坛事度僧。天祐二年,王延彬为创院居之。名曰建法。使授毘尼。学者咸会。众肃以和”^⑤。他的弟子良苑,再传弟子洛彦、本敷,皆以律学闻名^⑥。与弘则同进的律学大师还有叔端,叔端俗姓陈,曾在龙华寺向律宗大师维贤学习。后来,他“出游吴越,遍习诸经,教海源底,靡不洞达”。晚年隐居泉州山中十年,泉州刺史王延彬请他出山,为他造清凉精舍。叔端持律严谨,著书多卷^⑦。闽北的志贤也是著名的律僧。“释志贤,姓江,建阳人也。夙心刚整,幼且成规,既遂出家,寻加戒品沾尝渐教,守护诸根,抗节修心,不违律范。天宝元年于本州佛迹岩承事道一禅师,曾无间然,汲水拾薪,惟务勤苦。游方见金华山赤松洞,是黄初平叱石羊之地,郁林峻岭,泉湖百步许,意乐幽奇,既栖巅顶,野老负香粳蔬茹以供之。时天大旱,贤望空击石曼骂诸龙曰,若业龙无能为

① 赞宁:《宋高僧传》卷一三,曹山本寂传,第308页。

② 何乔远:《闽书》卷一三六,第4101页。

③ 胡太初等:开庆《临汀志》,寺观,第69页。

④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开士志,第20页。

⑤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开士志,第21页。

⑥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建置志,第12页。

⑦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开士志,第24页。

也,其菩萨龙王胡不遵佛敕救百姓乎?敲石才毕,霁然而作,嫠人咸悦。后游长安,名公硕德列请为大寺功德之师,贤悚然不顾,明日遂行,登五台,寻止太原甘泉寺。道俗请学禅理者继至,无疾而终,敕谥大远禅师,旌乎厥德矣。”^①

律宗内部亦有分派,被称为制教三宗。其中,实法宗重视《俱舍论》,主张色法戒体。假名宗重视《成实论》,主张非色非心法戒体;贺教宗重视《法华经》、《涅槃经》、《楞伽经》、《摄论》等,主张心法种子戒体^②。在泉州开元寺中,亦有律宗诸派分立的现象。例如,“释令言,仙游人,陈姓。出家苦行,后游燕赵,传法华上生二经。归创院开元之西,曰‘罗汉’,居之。常诵法华,通夕不寐。二经学者,纷集其门”^③。从其重视《法华经》来看,他应为圆教宗。此外,开元寺还有重视《俱舍论》的实法宗,该寺名僧宣壹兼通二家,“教授《四分》、《俱舍》、《涅槃》,咸通究之。乃为二众依止”。唐末,威武军节度副使王审知请他到福州主持戒坛,剃度三千余众^④。该寺律宗兴盛,师徒相传,一直延续到宋代。

法相宗。又称唯识宗,是唐初名僧玄奘开创的学派。其主要经典是玄奘翻译的100卷《成唯识论》。唐末泉州开元寺名僧道昭兼习律宗与唯识宗,但最终研习唯识宗为主,他著有《成唯识论注》80卷,被后人奉为至宝,民间传说他是文殊的化身^⑤。在泉州开元寺,还有一座“新法华院”,“王延彬创于寺之西北,居法师省权。以权善法华故名”^⑥。

净土宗。该宗开创于北魏,兴盛于唐代,主张专念阿弥陀佛,每日万遍,持之以恒,便可成佛,是一种中国化的、很受老百姓欢迎的佛教宗派。该宗何时进入福建不可考,但是,唐末泉州开元寺已有了净土宗。据载,该寺范围内有一条“净土巷”,并有一座“净土外白衣院”,“唐天复间,讲僧楚勤居是院。孙居锐、秘亨,俱善讲说”^⑦。

华严宗。华严宗也是唐代很流行的一个佛教派别,曾经东传高丽。福州鼓山的“开山灵峤禅师”曾在鼓山诵经驱怪,而他所诵的经书,即为“华严经”。所以,

① 赞宁:《宋高僧传》卷九,唐太原甘泉寺志贤传,第207页。

② [日]镰田茂雄:《简明中国佛教史》中译本,第231页。

③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开士志,第23页。

④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开士志,第23页。

⑤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开士志,第25页。

⑥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建置志,第14页。

⑦ 元贤等:《泉州开元寺志》,建置志,第13页。

唐代中叶所建鼓山寺院,其名为华严寺^①。不过,迄至“会昌灭佛”的事件发生,“鼓山僧徒逃窜皆尽”^②。华严宗在闽中也受到打击。五代时,高丽人将华严宗经典带回中国,使华严宗再一次复兴。

按照佛经记载,华严宗与支提山有关。《华严经·菩萨住处品》云:“东南方有山名曰支提,现有天冠菩萨与其眷属一千人俱常住说法。”^③但是,据其经文,支提山应是在印度某处吧?福建长溪县亦有一座名山叫支提山,唐末五代,此地有“经中所谓天冠菩萨领徒居此演说华严”的传说,^④当地僧人元白于宋初发现唐会昌汰僧时的藏经,相传这是华严大师元表留下的。《支提寺图志》记载:“元表法师,高丽僧也。则天朝居(支提山)那罗岩,以木函盛《华严经》,朝夕奉诵。……于时会会昌沙汰,弃经藏室中。逮宋受命,樵者迷道于至岩下,闻梵音清雅,及出传布远近。邑僧元白闻之,因往瞻礼。表曰:‘深山无路,仁者从何而至?’白曰:‘自远趋风,仰承圣教。’表曰:‘我尝游西域,遇心王菩萨授我是经,并示东震旦土支提山者,乃天冠住处,可觅其所。故负经至此。去兹二十里那伽龙潭是其地也。’遂以经授白,腾空而去。白瞻仰无殆,恨,同僧慧平、慧泽迎经于甘露寺供养,纸墨如新。”^⑤这本身是一个神话,其事实大约不过是僧元白发现了前人所遗《华严经》而已。其时福建在吴越国的统治之下,元白便将这一发现告知吴越王钱椒,吴越王便在发现经的地方大建寺院,命名为“华严寺”,遣僧了悟主持^⑥。可见,在吴越国时,此地应为华严宗的一个据点。

总之,唐末五代,福建有各种佛教流派传播,但是,从以上叙述中也可看到:福建的法相宗、律宗、净土宗、华严宗等教派,发展层次不太高,没有产生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名僧,这也许与其著作大多遗失有关。真正能代表这一时代福建佛教成就的是禅宗诸派。

宋代福建除了禅宗之外,其他尚有净土宗与华严宗、律宗等佛教流派。净土宗没有烦琐的修炼方式,在民众中间传播很广,而以戒律严整闻名的律宗,仍然拥有广大的信徒,例如,“福州永福县有村律院,伯仲二僧同房”^⑦。华严宗在福建的

① 黄任等:《鼓山志》卷四,沙门,鼓山寺清刊本,第1页。

② 黄任等:《鼓山志》卷一四,外纪,第2页。

③ [清]崔崧:《宁德支提寺图志》卷一,福建省地图出版社1988年,第1页。

④ 崔崧:《宁德支提寺图志》卷三,第26页。

⑤ 崔崧:《宁德支提寺图志》卷三,第25页。

⑥ 崔崧:《宁德支提寺图志》卷三,第26-27页。

⑦ 洪迈:《夷坚志·甲志》卷八,永福村院犬,中华书局1981年,第67页。

影响不可忽略。在宋代初年流传着这样的一个传说:晚唐华严宗名僧元表在宁德支提山埋经,宋初被僧人发现。当时福州在杭州钱氏政权的控制下,僧人将这些经典献给钱王。于是,钱王派华严宗大师——了语,至支提山开创支提寺。从此,支提寺成为华严宗圣地之一,在国内与朝鲜享有盛名。此外北宋华严宗中兴教主——净源也是福建人,他长住江南报恩观音院,“四方宿学,推为义龙”,高丽王子削发为僧,航海至吴,拜他为师。净源对华严宗的振兴有很大的功劳。^①

五、唐五代福建的禅宗高僧

就像古代中国文化中心在北方中原区域一样,在唐中叶以前的漫长时期内,中国佛教中心也一直是在黄河流域。这一情况在唐中后期开始有所变化,盛唐时期,广东人慧能继承了禅宗五祖弘忍的衣钵之后,返回南方传教,形成了南宗教派,乃至中晚唐,南宗禅学成为中国佛学主流,而其时佛教极盛,人们都认为,佛教中心已在南方。当时,南宗禅的代表人物主要在广东、江西、福建等地活动,福建也属于南方省份,得风气之先,许多人成为优秀的禅师。例如,黄檗山的开山祖师正干禅师成为慧能的弟子之一^②。而慧能亲传弟子马祖道一在福建的影响是极为深远的。民国《福建通志》有一句话:“福建唐代高僧天下莫盛焉,而五代及宋由此选,方兴未艾也。”^③这并不是夸张的话。以下记录唐宋福建的高僧。

(一) 马祖道一在福建的影响

唐代名僧马祖道一是禅宗发展史上影响最大的人物之一。禅宗相传为印度名僧达摩所开创的一个佛教宗派,发源于河南少林寺,迄至六祖慧能之时,禅宗的重点传到了南方诸地。慧能的弟子主要分两大系统:南岳怀让派下与青原行思派下。南岳怀让最重要的弟子是马祖道一,道一晚年在洪州说禅,引发官僚及民众的追捧,从而使禅宗在思想界占据统治地位。马祖的弟子是晚唐开辟禅宗新流派的主力,他所提倡的“平常心”,成为中国文化最宝贵的财富。由于马祖在历史上的地位,明代朝廷曾下令祭祀马祖道一,他是佛教中唯一得到朝廷长久祭祀的中国僧人。

马祖道一成名之前,曾于建阳佛迹岭修禅,^④其年代约为公元742—744年。

① 郭朋:《宋元佛教》,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,第137页。

② [清]清馥、道暹重修:《黄檗山志》卷三,僧,福建地图出版社1989年点校本,第29页。

③ 陈衍等:民国《福建通志》,《福建高僧传》卷一,民国二十七年,第1页。

④ 江远青等:道光《建阳县志》卷十九,仙释,建阳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1986年,第681页。